

第一章 绪 论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城市(镇)体系,按其现代的意义来说,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镇网络的有机整体。通过对城镇体系形成、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合理组织体系内各城镇之间、城镇与其体系之间,以及体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互联系;运用现代系统理论与方法,探求整个体系的整体效益,即寻找整体(体系)效益大于局部(单个城镇)效益之和,促使体系从无序向有序转化,达到整个“城市——区域”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最佳的总目标。在我国,其研究主旨在于揭示地域城镇及其体系的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合理分布社会生产力,合理安排人口和城镇布局,充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进行国家(或地域)经济战略部署提供依据,因此进行国家城镇体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重大的理论实践意义。

城市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数量,城市的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联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具有了城市体系形成的客观基础;而城市体系一旦

形成,它对整个城市群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平衡作用。

对于“周秦关中城市体系发展研究”课题来说,研究的是历史时期关中一带城市体系的发展状况,目前没有直接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相关的研究成果方面,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帮助。

(一) 现代西方城市体系相关研究成果

1960年,美国地理学家邓肯和他的同事们在《大都会与区域》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体系的概念。此后,城镇体系研究的文献大大丰富起来,主要研究国家城镇体系中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城镇体系的空间相互作用、城镇规模的规律性、城镇体系的互相依存性和扩散性等问题。在实践方面,探讨了美国城市体系变化和多伦多—斯特拉特福城市走廊体系。

上世纪70年代,国外城镇体系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帕尔、贝里、耶费雷伊、鲍恩、皮瑞特等在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空间扩散、区域发展、“经济脉冲”、体系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公共政策、潜结构分析,信息反馈与信息流(网络)、联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总结。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数学及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对系统的最优化、城镇等级分布模型以及动态模拟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但进入80年代以后,国外城镇体系的研究,由于一方面受激进地理学派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普遍认为城镇体系研究已到了顶峰,在理论上难以突破,只是实践应用而已。

国外近年来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对发达经济条件下的城镇体系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应用研究;第二,城镇体系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并将其与城市化结合进行研究;

第三,城镇体系在其理论研究上更趋向于系统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数量化和计算机的应用;第四,城镇体系的观点被逐步应用于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实践中,如英国的“反磁力吸引体系”,日本的“定居设想开发方式(三全综)”,法国的“平衡发展”,苏联的“组群式城镇分布系统”,波兰的“城市结节地带类型”,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分布系统”,联邦德国的“地区中心建设纲领”,美国、加拿大的“城市体系研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和规划工作者也掀起了对中、小城镇开发研究的热潮。他们对国家城镇建设的设想,基本轮廓都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多层次、不同级别的城镇居民点体系,以消除目前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和过于分散乡村零散居民点的分布不平衡现象。

综上所述,城市体系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

(二)中国的现代城市体系研究

我国有关城市(镇)体系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其真正的研究则开始于建国后,特别是最近的20年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梁思成教授就曾在重庆《大公报》上撰写《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专门介绍了美国沙里宁的城市“有机疏散”学说,希望能够在战后推动我国城镇体系的研究。他认为:“我们国家正将由农业国家开始踏上工业化大道,我们的每一个市镇都到了一个生长程序中的‘青春时期’,假使我们工业化进程顺利发育,则在今后数十年间,许多的市镇农村恐怕要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然发育,这种发育,若能预先计划、善于辅导,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组织体,则市镇健全,居民安乐,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这一科学愿望终成泡影,无法实现。

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实践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城镇体系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开展,致使城市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了背离客观经济规律的失误。改革开放之后,确定了“以市带县,实现城市领导农村,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核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流通,逐步形成以各种城市为依托,各种等级、各种类型的经济区”的方针;同时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这些决定为我国城镇化是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发展集聚为系统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相衔接的有机体系的道路,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一个全国范围的结合国土规划、城市——区域规划、大城市市域规划的城镇体系研究蓬勃发展起来,方兴未艾。现代城市体系的研究密切结合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为城市规划、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

综观我国近 20 年内有关城镇体系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 城镇体系的研究,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按照国家和地方的具体任务开展工作的。因而它与国外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成果的完成可通过领导部门的鉴定,并交付地方实施,这与单纯从理论上总结或只具认识作用的研究很不相同。

2. 城镇体系研究工作开展很快,范围很广,从事研究的学科由城市规划界、地理学界扩展到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领域,而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根据目前国内有关城镇体系研究的文献,大部分地区都作了城镇体系规划工作;与此同时,结合国土规划还进行了一些地域城镇体系研究,如珠三角地区(刘望保:《珠三角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研究》,《中国城市化》2003 年第 10 期)、长江

三角洲地区(董斌:《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结构的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06年第4期)、环渤海地区(姜丽丽等:《环渤海港口城市体系发展与布局探讨》,《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年第3期)等。关中现代城市体系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夏显力的博士论文《陕西关中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研究》(2004年),就分析了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区域发展条件、思想观念、开放程度及经济基础等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从职能组合结构、等级规模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关中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问題。

3. 在结合实践开展城镇体系研究的同时,也初步进行了一些理论总结。概括其内容大体上包括城镇体系发展机制,城镇体系组织结构,城镇体系规划指导思想,城镇体系规划内容,城镇体系规划程序,城镇体系规划定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我国近20年城镇体系研究的区域类型更加丰富和多样;研究内容仍以结构研究为主,机制研究、优化调控研究仍需深入展开;可持续的城镇体系规划观念已深入人心;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研究中的应用取得了丰硕成果,GIS及遥感技术也开始应用于城镇体系的研究中。

总的来讲,我国的现代城镇体系研究综合性成果,主要为:《中国城市地理》(顾朝林,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国城镇体系规划——理论·方法·实例》(顾朝林,建工出版社,2005年)等。

(三)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相关研究

历史时期城市(镇)体系的相关研究,与现代城市体系研究相比明显不足。主要研究成果有:顾朝林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本书用一定的篇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历史时期中国城镇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并对此进行

了独有见地的分析与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及思路;吴晓亮著《洱海区域古代城市体系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从方法上为我们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本课题基本内容及难点

本课题研究周秦时期关中地区城市体系的发展与发育,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

主要包括相关研究成果论述、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分析等问题。

第二部分:关中城市体系兴起的地理环境

首先,界定古代关中的概念。分析“关中”之“关”的位置与作用,文献记载的“关中”,有两关之中、四关之中、五关之中的几种说法,通过论证相关文献记载,确定所涉及的陇关、函谷关、武关、临晋关、散关等关的位置及作用,由此界定关中平原的区域范围应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相似,包括今西起宝鸡峡、东到潼关的渭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其面积约为3.4万平方公里。

其次,分析关中城市兴起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因素、地貌因素、水文土壤因素以及人文地理环境(包括良好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充分的交通地理条件、有利的军事地势)等各方面。同时,由于“秦川”八百里所特有的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极好的活动场所,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白家人、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姜寨人便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第三部分:西周时期关中的城市体系

由于西周时期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我们只能通过分析关中地区大中城市之间的关系——包括西周政权在关中的两座都城岐周与宗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座都城与诸侯采邑的关系,来确定西周时期关中的城市体系发展状况。

西周的城市体系,由都城、诸侯国都及诸侯采邑三级组成。在关中,由于为王畿所在,没有诸侯封地,因此,西周时期关中的城市体系,由都城和贵族采邑两级组成。

西周时期的岐周、宗周、成周三座都城依次向东,岐周、宗周坐落在关中,其都城功能和政治地位各有不同。从都城功能来看,在西周时期,岐周是宗教祭祀意味较为浓厚的都城,是圣都;宗周承担着主要都城的功能,是行政都城;成周主要承担前线都城的功能,军事意义较为浓厚。从政治地位来看,在整个西周时期,宗周从建立伊始就一直是主都,而岐周和成周均处于陪都地位,只不过到西周中晚期,由于政治、军事、宗法等种种原因,关中地区两座都城的政治地位逐渐降低,而位于关东地区的都城成周的政治地位愈益重要。

关中是宗周王畿之地,有着较多的贵族采邑,它们多数聚集在岐周、宗周附近,分别与西周在关中的都城宗周、岐周组成了粗具规模的城市体系。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帮助我们廓清西周时期在关中的贵族采邑的位置和分布规律。

第四部分:秦代关中的城市体系

从春秋时期开始,秦在关中西部艰苦经营,逐渐扩展势力至关中中部,最后建都咸阳统一全国。这一时期秦政权有都城的迁移及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秦都城之间的关系是本部分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小型的城镇如杜邑、丽邑等,都城咸阳与这些小城镇的关系也体现了秦代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

状况。

秦国在关中的城市体系有三重等级的城市构成：都城、前都城及县治。

秦在关中的都城主要包括西垂（西犬丘）、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栌阳、咸阳等，分析其都城设置及都城关系，得出：秦国都城体系中的都城可以分为两种等级，一种是现在的都城，包括圣都、军事性都城等，属于城市体系中最高等级；一种是已经废弃的都城，这些都城废弃后虽然政治地位不如以前，但仍是通都大邑，是仅次于都城的城市。

随着郡县制的逐步推行，县级治所均设在城市之中，从而初步确立了以朝廷所在城市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络分布状的封建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秦代关中主要的县级治所有三十多个，它们与咸阳及其他都城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

第五部分：余论——关中城市体系发展的特点及其对后世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周秦关中城市群的基础之上，总结其城市体系发展的特点，并研究历史时期关中城市体系布局对后世城市体系布局的影响。

本课题的难点有两个，一个难点是如何复原周秦关中城市体系，周秦时期关中为都城所在，其文献记载相对较为丰富，但有关城市体系的记载在古代文献当中都是较少的，因此，历史的复原工作是本研究的一大难点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的另一个难点在第五部分，研究历史时期关中的城市体系，其目的就在于“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因此，本课题的着眼点在于对现代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本课题的难点所在。

三、本课题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

城市体系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周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机制,主要在于各级行政中心的设置和重要手工业中心及各种商品集散中心的形成,其组成是以首都为中心,采邑与县城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列组群。对于关中这个特定区域,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数量,城市的地区专业化分工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联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具备完善的城市体系形成的客观基础;而城市体系一旦开始形成,就对整个关中区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平衡作用。

研究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第一,研究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与城市体系相关的理论。

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与未来,而目前对于城市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城市体系的要求及城市体系的布局等,这无异于空中楼阁。研究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发展,能够填补城市体系研究中的时间空白,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城市体系理论。

第二,研究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有利于现代关中城市体系的布局。

现代城市体系规划是在历史城市布局基础之上进行的,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体系,对现代城市体系的布设是一个有力的借鉴。

关中平原是一块比较理想的地理区域,地势平坦,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人口密度相对较大,因此,关中平原城市体系的发育比较

早。周秦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期,又因为几个王朝均建都关中,重视关中的经济、文化建设。因此,关中的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完善。历史时期关中的城市体系发展状况,对现代关中城市体系布局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研究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升西安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加快西安城市化进程。

关中城市群的中心就是西安,关中城市体系的枢纽也是西安,西安在关中城市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周秦时期,西安作为全国都城所在,是关中地区的首位城市。因此,研究周秦关中城市体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研究西安城市枢纽作用,对提升西安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加快西安城市化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四、本课题的资料准备与研究手段

(一) 资料准备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对于先秦历史的认识只局限于若干书面文献资料,直到近代以来,随着甲骨卜辞的发现和铭文研究资料的深入以及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相关研究资料才极大地丰富起来。

1. 书面文献资料

研究先秦历史的文献资料,由于年代久远、辗转传抄等原因,一般需要进行辨伪考证以确定其可靠程度。主要文献有:

《尚书》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称为《尚

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仅秦博士伏生壁藏之,存 28 篇,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清代学者孙星衍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较完备的注释本。《今文尚书》是研究商周史的重要文献资料,记载了当时的重要史实及制度,其中有些内容涉及西周都城地望和都城建设的问题,例如在《尚书》的周初八诰中,《召诰》、《洛诰》、《多士》、《康诰》等篇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营建成周的历史事件。这些记载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诗经》

《诗经》原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称《诗经》。后来,立于学官的齐、鲁、韩三家诗亡缺,而未立于学官的毛诗独传,故《诗经》又称《毛诗》。东汉郑玄为《诗经》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40 卷。《诗经》广泛反映了先秦时代的社会风貌,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及都城也有一定涉及,例如对西周时期“岐下”、丰、镐、“宗周”等都城均有所记载。

《左传》

学界认为《左传》是由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加工而成的,大致以《春秋经》的编年为纲,起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左传》详细、真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城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春秋时期秦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逸周书》

《逸周书》原名《周书》。《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因其内容不见于《尚书·周书》,故称为《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是汉代刘向根据朝廷所藏材料整理编定的,其中有战国时的伪作,也有少数周代作品,对本研究确定宗周与成周的都城地位及都城结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

《国语》

《国语》21卷,分西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历时五百余年,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中有许多关于先秦地理、战争形势的描述。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书。此书早已亡佚,只在南北朝至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存有佚文,这些佚文经清代学者汇集,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另有《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南宋以前的人辑录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一些史事很有参考价值,西周时期多都并存制度的研究运用了《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

《战国策》

是战国时期所辑录的策士、纵横家的言论总集,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次序,称《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诸国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是研究战国时的重要文献。《战国策》的资料记载对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关系与县邑建设有很大帮助。

除上述几种主要文献外,其他先秦诸子书籍如《孟子》、《管子》与《周礼》、《周易》等也有不少与城市相关的记载,《史记》更是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对先秦时期城市的演变、设置及城市之间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记载。后世文献(如《汉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所辑录的先秦城市体系记载也是必不可少的资料。

2. 甲骨卜辞

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先秦城市体系的甲骨文资料主要是周原甲骨。

1977年春在陕西周原地区的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周甲骨,共17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卜甲共有290多片,这些卜甲记载了商周关系、占卜祭祀、农作田猎、地理官制等史实,对于

西周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诸多专家学者对周原甲骨进行了研究,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①不仅将包括周原甲骨在内的西周甲骨摹本聚集在一起,而且对西周甲骨的特征、断代、科学价值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关于西周甲骨的总结性论著。周原甲骨中关于先周和西周早期都邑的记载及西周时期诸侯封地的记载等都是本研究需要的资料。

3. 青铜铭文

殷代铜器多无铭文,即使有,字数也较少。周代铜器则大不相同,有铭文的铜器达 3000 多件,其中不少铭文堪称鸿篇巨制,《毛公鼎》有 497 字,《齐侯罍》有 492 字,《召鼎》有 403 字,《散氏盘》有 357 字,《大盂鼎》有 291 字,《克鼎》有 289 字,《史墙盘》有 284 字,周代的许多军国大事都被勒于铜器。因此,周代青铜器是我们研究周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利用铜器铭文研究历史从很早就开始了。近代以来对于铜器铭文的著录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1937 年罗振玉印行《三代吉金文存》,收录商周青铜器铭文 4800 多器。郭沫若对铭文的研究主要成果包括 1932 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1958 年又进行了增订)、1931 年出版的《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1952 年出版的《金文丛考》。解放后对金文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 版)、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 年)、容庚和张维持的《殷商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等。

^①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 年。

青铜铭文中有很多记载涉及西周都城、采邑的名称,如宗周、成周、周、莽京等,甚至详细记载了都城内的宫殿、祭祀设施等建筑;有些铭文同时出现2个或3个都城与采邑的名称,这样,可以明显界定都城之间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4. 考古学资料

考古学的资料对于研究周秦时期的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座遗址是否含有都城要素,从而确定文献记载中都城的具体地望。同时,我们可以根据相关考古资料(如文化层的厚薄、都城使用的上下限、都城规模)确定都城的使用年限及政治地位。

本研究着重应用上述各资料中与城市相关的资料,从中梳理和考证具体都城的地望、建都年代、与其他都城的关系及其政治地位等城市体系信息,以完成本课题。

(二) 课题研究方法

为完成上述周秦时期关中地区城市体系的研究任务,必须选择有效的研究方法途径。总的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为思辨与实证两大类。思辨的方法是以应然为价值判断目标,是根据“应该怎样”的演绎、推理作出判断的,其特征是价值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而实证的方法则是以实然情况为价值判断目标,其特点是实证分析过程要先于价值判断。两种方法之间虽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知名学者都是跨越二者兼而有之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应鼓励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根据不同学科与研究内容不同进行不同方法的选择。只有多样化才能使我们有效地从多角度、多层次认识周秦时期关中地区城市体系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不仅着力于具体史实的细节研究,而且在解释性工作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力图对我国周秦时期关中地区的城市体系分布特征及原因等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多维视野的研究和思维方法。本课题的研究实体为先秦城市体系,这涉及到多学科的综合内容,当然必须借助多种学科、多维视野的不同研究方法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多维透视。本课题研究将以城市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借鉴历史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成果。特别注意将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课题研究中去,运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研究目标。

多维视野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法。思维可以根据不同的特点分成一维、二维、三维、四维等。一维方法是纵向的、直线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往往关注单线的因果关系,极力构造一种因果链。二维方法是横向的、平面的、比较的思维方法,横向扩大视野,平面大于直线,比较可摆脱绝对,因此,这种思维方法与一维方法相比是一个大的飞跃。三维方法是一种纵横统一的、立体的思维方法,注重解析事物的结构,注重形成系统。四维方法是时空统一的、螺旋式的、相对的互补的思维方法。各种思维方法各有利弊,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综合运用就可以形成多维视野。

其次,系统分析的方法。贝塔朗菲指出:“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性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①系统论的观点表明:任何事物都是由各要素按一定秩序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论提供了事物整体与

^① I. V. 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14页。

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规律,主要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系统之所以称为系统,根本之点在于它具有组成部分自身所没有的整体功能,整体的功能只存在于组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几个孤立部分的综合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体的功能。因此,整体研究和部分研究要相结合。在研究中,部分的研究十分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切结论都应当来自于对许多基本问题的探讨。但是,部分研究必须有宏观理论的指导,还应将对“部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对已经复原的史实进行理论性概括,得出较为完整的认识。所以,在研究中尽可能做到部分与整体的结合。

再次,在充分占有、辨析并运用现有材料和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合理的逻辑论证。虽然近年来考古的材料相当丰富,极大地弥补了古文献的不足,但应该恰当地看待文献资料价值,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局限于目前我们掌握的先秦时期的研究资料及笔者本身的研究水平,许多结论不得不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逻辑推论,这在研究中是无法避免的。

具体来说,本书的研究方法包括:

1.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能帮助我们区分和解释一般和特殊的现象,因此横向的(空间的)和纵向的(时间的)比较分析是本研究贯彻科学方法所必须的。比较研究法是大部分研究都要采用的方法,对于关中地区周秦城市体系的研究也不例外。将比较法应用于本研究,就是根据特定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王朝即周与秦在关中的城市体加以对照,进而研究关中城市体的发展特征、发展趋势等问题。

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即个案分析法),是对真实世界的某个具有典型特征性事例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的方法。案例分析重在从个案中抽象出普遍性原理,也就是把个案普适化。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个案分析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步骤:一是搜寻有意义的个案命题。二是如实地描述特定事物间的来龙去脉。个案素材要真实客观,尽量少搀杂个人主观和偏见,不论研究结果对于最初的假设是起支持作用还是起否定作用,均应确保价值中立。三是对各个变量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并借助逻辑的力量证实或证伪某个结论、理论模型或范式。四是使个案研究结论普适化,推而广之。

关于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的研究必须遵循案例分析法的要求,研究周、秦政权的的城市体系建设,复原其都城体系及都城与采邑和县邑的关系。

3. 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是指将研究事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范围或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研究,即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去把握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①。伊·拉卡托斯(ImerLakatos)在其著作《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就曾指出,“在进行一个历史上的个案研究时,应采取两个步骤:一是作出合理重建;二是尝试同历史进行比较。”^②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也说过“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历史的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

^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②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73页。